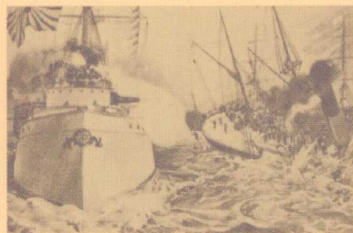


JIAWU ZHANZHENG QIAN ZHONGRI XIXUE BIJIAO YANJIU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

◎李少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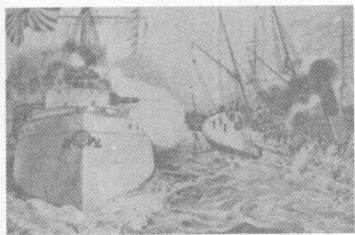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

◎李少军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李少军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 - 7 - 216 - 05406 - 5

I. 甲...

II. 李...

III. 西方文化—传播—对比研究—中国、日本—近代

IV. K250.3 K313.4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7704 号

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

李少军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科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305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1.75
插页:2

版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406 - 5

印次: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作者简介

李少军，湖北汉阳人，1958年6月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下乡，在湖北省孝昌县农村担任民办教师，1978年3月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此后一直在武汉大学学习、工作，其间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并先后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访问研究。参与撰著的《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受到学界好评，获1997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另有个人专著《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魏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及论文、译作多篇。1999年以来主持国内外科研课题若干项。

责任编辑 王隽
封面设计 张弦

序 言

冯天瑜

中国与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两国人民皆为蒙古人种，共具汉字、儒学、华化佛教、律令制等文化事象，以至有以“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瓣”来比拟中日两国相似性的说法。而且，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体相当，并都面临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来袭，闭锁的国门分别于18世纪40年代、18世纪50年代先后被打开。然而，国门开启后的中国与日本，其发展路径却颇相径庭：大而弱的中国长期遭受列强宰割，于百年间挣扎在半殖民地的泥淖之中，近代化进程一波三折，而日本却成为欧美以外罕见的“近代化优等生”，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小而强、极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人们在追究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差别时，当然不满足于中日文化相似性的认识，而试图从中日文化特质之异里寻求部分解答，其间，围绕中日两国对待西学的态度、采撷范围、吸纳深度的比较研究，是百年来中外人士历久不衰的考析课题。置于我们案头的这部李少军教授所著《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以下简称《比较研究》）便是关于此一论题的新锐之作。

（一）《比较研究》将近代中日西学置于学术史的长时段加以考察，正视近代前夜中日西学已形成不同基础，以洞悉其后出现比较研究的历史渊源。

以往人们探究近代中日西学，多着眼“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这一对应时段两国西学水平的比较，而忽略此前两国西学

的基础区别,而《比较研究》有着较宏阔的学术史眼光,用力追究中日两国西学积淀与传承的历史过程,将视线上溯到19世纪前半叶,分别论列嘉庆及道光前期中国与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的西学传入情状,对比国门开启之前数十年间中日两国西学诸门类(天文历算、地理学、医学、语言学)的不同积累程度,考察两国学界不同的西学观,揭示一个重要事实:幕末日本已经初步形成研习西学的知识界群体,而嘉庆、道光间的中国则只有个别接触西学的人士。凡此种种,构成中日两国国门开启之前的西学根基之异。

(二)《比较研究》对中国爆发鸦片战争至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日西学状况进行比较,揭示此间中日西学的落差已经加大,形成不同格局,直接原因在于两国应接西学东渐新阶段之内在动力强弱不同。

鸦片战争间中国产生一批译介西学的书籍(《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并很快流传于幕末日本,对日本开国思维有所启迪。以往人们据此强调19世纪40—50年代日本西学受中国影响的一面。《比较研究》认为不宜夸大此种影响,尤其不可得出19世纪中叶中国西学水平高于日本的结论。《比较研究》展示的情形是:面对西学东渐,日本的应接比中国积极主动、较富成效,而中国虽有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但遍漫朝野的漠视外部世界的陋习和强烈的“内华夏,外夷狄”意识,极大地妨碍了中国人了解和吸收西学,以致西学的整体进展迂缓,徘徊不前。对于国门初开之际中日西学的这种差异,以往多归之于两国对待外来文化传统的不同,《比较研究》没有止步于此,而用力于论析当时两国政界、学界民族危机感的强弱之别,汲纳西学的内在动力大小之异,研习、传播西学举措的高下之分,从而为近代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提供了较具历史厚度的诠释。

(三)《比较研究》认为明治日本汲纳西学的指导思想不宜以“和魂洋才”一言以蔽之,更不宜与清朝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论相等同,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对待西学的态度存在重大

差异,当时两国政权在西学传入和吸收问题上的作为也大相径庭。

以往有一种习见:日本明治维新对待西学的指导思想是“和魂洋才”,并以之与中国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论相类比。《比较研究》认为,此说是一种误解。明治政府五条誓文所言“求智识于世界”,以及福泽谕吉提出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才是当时日本追求西学的纲领性理念。至于“和魂洋才”说的流行于近代日本,则是日本的文化保守派面对维新运动展开、西学广泛传播、自由民权运动高涨而作出的反弹,并非明治维新的主流文化观。澄清此一关节点,也有利于消除将清朝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对待西学指导思想相提并论的认识误区。《比较研究》指出,晚清的“中体西用”论认定中国固有的伦常名教、根本制度优越,而只有器用不及西洋,对于西方“文明的精神”还缺乏起码的认知,更谈不上要借此来推动社会变革、改变国民风气和面貌;而明治日本承认在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上落后于欧美,将争取达到像欧美那样的“文明”状态作为目标,因而没有将反映西洋近代文明的西学局限于“器用”层面,而主张广泛吸收西学,并与改变日本社会的风气与面貌、进行社会变革联系起来。作者进而对比清政府与明治政府在引进和吸收西学上的不同作为,对比近代中日两国引入西学的实际效果。

《比较研究》在大量实证考察的基础上,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近代中日西学水平形成明显落差,而这种落差正是中国在甲午战争遭到惨败的原因之一。此书在结尾处说:“从中日比较的视角来审视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西学传入与吸收过程,笔者觉得很难有欢欣愉悦之情,而认为必须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鲁迅有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比较研究》作者的情怀,暗合了夫子的名论。从历史中获取教训(尤其是沉重的教训),需要勇气,需要正视事实,需要从令人难堪的事实中引出理性的结论,以指示后面的进路。

2007年11月19日撰于武昌珞珈山麓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国门打开前中日西学根基之异	(19)
一、关于国门打开前中日西学积淀的考察	(19)
1. 天文历算	(20)
2. 地理学	(23)
3. 医学	(26)
4. 语言学	(29)
5. 有关西方的知识	(35)
二、国门打开前中日学界与西学关系之异	(41)
1. 中日西学群体之有无	(41)
2. 中日学界对待西学的不同态度	(48)
第二章 鸦片战争后中日西学传入之不同格局的形成	(64)
一、西学东渐新阶段的到来	(65)
1. 西学东渐新阶段开启	(65)
2. 新的西学东渐浪潮波及日本	(75)
二、中日对外危机感之异所导致的西学冷与热	(82)
1. 鸦片战争前中日对外危机感强弱及对吸收西学的不同影响	(83)
2. 中日对国门打开的反应之异与吸收西学差距的扩大	(99)
三、中日走向世界之异与认知西方近代文明的迟速	(147)
1. 清朝迈步走向世界之迟缓	(148)

2. 国门打开后日本快速向外迈步	(163)
四、中日吸收新的西学之异	(180)
1. 1860 年以前中日吸收西学之异同	(181)
2. 1860 年后中日吸收西学之范围和层面差异	(186)
第三章 “中体”铜禹域 西潮涌东瀛	(208)
一、1868 ~ 1894 年间中日对待西学的指导思想之 比较	(209)
1.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不宜相提并论	(211)
2. “求智识于世界”、“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才是 明治维新对待西学之指导思想的标识	(215)
3. 中日对待西学指导思想之推移	(230)
二、中日西学传入实态考察之一：国家政权相关作为 之异	(246)
1. 两国统治者与西学距离的远与近	(246)
2. 中日国家政权在西学问题上的作为之比较	(260)
三、中日西学传入实态考察之二：两国社会因应西学 传入之异	(313)
1. 两国社会自主传播、吸收西学能力之弱与强	(313)
2. 社会矛盾与西学关联度之低与高	(323)
3. 对西学传播、吸收的呼应面之小与大	(332)
四、对西学传入中日两国之实际效果的估量	(338)
1. 科技引进成效对比	(338)
2. 西方人文社会学说传入、吸收的效果对比	(342)
结 语	(353)
参考书目	(358)
后 记	(369)

引 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中日两国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先后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都曾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但相隔不到半个世纪，两国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状况——中国在半殖民地的苦海中越陷越深，而日本却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新崛起的角色，加入到压迫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列强之中。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宣告了这种反差强烈的格局正式形成。

近代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一直是学界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原因作了许多探讨和研究，其中，两国吸收近代西学的差异及其深远影响，引发了很多思考和议论。

西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都是从 16 世纪前半期随着早期西方殖民势力东来而开始发生的。就其历程来看，在 19 世纪之前，西学在中日的传播有不少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都受到西方殖民扩张的推动，与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中日两国都由此接触到西方近代初期的自然科学、宗教和一些人文社会方面的知识，且都由于西方教会势力的活动危及统治秩序，导致日、中统治者先后取缔教会的传教活动，并最终殃及宗教之外的西学传播。当然，中日之间也有差异：由于中国一直是西方势力在远东扩张的重点目标，相应地，在传教及其他西学的传播方面，中国也就成为最主要的对象，进而成为东亚地区西学的中心；而日本从 17 世纪

初期实行锁国政策之后,长期不被西方势力重视,除了荷兰商馆这个极狭窄的途径之外,是以中国作为西学的重要来源;但从中日两国吸收西学的实际成效来看,如后面所述,日本在19世纪之前已超过中国了。然而无论如何,中日两国在被西方势力打开国门之前,西学的传播都还主要是文化领域的现象,且都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即使两国之间吸收西学有多少、深浅之分,但都还远不到影响国家命运的程度。

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标志着西学东渐的历程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后,西方势力就以武力先后打开了中日两国的国门。在此形势下,不管是否意识到,如何应对新的西学东渐,便成为严重影响中日两国命运的大问题了。

19世纪以后东传的西学,从总体上来看,除了宗教(此时基督教新教在西方的传教活动中成为重要角色)之外,反映了西方产业革命发生后近代文明的最新进展,既涉及与机器工业相联系的近代科学技术,又包括与已经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应的各种人文社会学说。

新的西学东渐历程,与先前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

联系在于:与先前一样,19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依然是作为西方对东亚扩张过程的一个方面引发的,故最初充当主要媒介的,还是西方传教士(所不同的是,以往是天主教传教士,而此时是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充当主力),且就东亚地区而言,西学东渐的顺序还是先从中国发端、后波及日本和朝鲜。从西学传播的实际情形来看,最初也和先前一样,由西方传教士掌握中国语言,为达到传教的目的而传播一些西方近代科技、介绍世界各国情况和有关人文社会问题的一些新知识、新观念。

区别在于:西学挟强权之威,大大增强了传播的推进力,不仅越来越深地楔入东亚各国的文化体系当中,而且成为影响其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19世纪东传的西学,内涵较以往有了极大的扩展与更新,而东亚各国应对西学东渐,也远远超出了精神文化领

域,而与政治、经济、军事等众多领域发生密切关系,西学传入快慢、涉及面宽窄、成效大小,与这些国家社会变革的广度、深度成正比;就影响西学传入、吸收的因素而言,较之于西方势力的直接推动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各国以往西学根基的深浅、对西学态度的冷热,国家政权政策方针的积极与消极,以及相关政治、文教体制能否作出相应的调整,根本问题在于东亚各国对于近代西学的内在需要的大小。

在中日两国之间,西学传入的新阶段首先在中国展开,而且西方势力出于自身需要,在中国为西学传播而投入的力量远比在日本要大。但是,到甲午战争爆发之时,从西学传入、吸收的成效来看,却是日本远远超出中国,由此深刻影响到两个国家的命运乃至于彼此相对位置的转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从中可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笔者希望就此进行探讨,提出粗浅的看法。

二、相关研究前史的回顾

1. 中国近代的名家之言

对于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应对西学东渐的巨大差异,我国有识之士早已给予很深的关注。

还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初,眼光敏锐的经世学人冯桂芬,就注意到中日两国对待西学的不同态度,感叹日本“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①;后来郭嵩焘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看到中日学习西方的差距,也产生“寝室积薪”^②之忧;经历了洋务新政而又对明治维新中的日本有所了解的王韬、薛福

①《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光绪十年豫章刻本,下卷,第43页。

②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伦敦致伯相〉;《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09页。

成、郑观应、黄遵宪等，都曾为“堂堂大国固犹不如日本”而痛心疾首^①。

在甲午战争结束的翌年即 1896 年，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凶险形势，维新变法运动的健将梁启超发表了他的名文《变法通议》，其中专门写了“论译书”一节，力言“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并就这个问题将洋务时期的中国与明治维新中的日本相比较，尖锐指出：清朝对外迭遭失败之后，“其上之阶显秩，下之号名士者，则无不以通达洋务自表异，究其日日所抵掌而鼓舌者，苟以入诸西国通人之耳，谅无一语不足以发矇”，“中国效西法三十年矣，……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究其缘由，“西人致强之道，条理万端，迭相牵引，互为本原，历时千百年以讲求之，聚众千百辈以讨论之，著书千百种以发挥之”，但在洋务时期的中国，却是“天下之大，而能真知者，殆无几人也”。可日本的情形大不一样：一旦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日本人就“忍辱变法，尽取西人之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之强也”。在梁启超看来，“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繙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吸收西学的方便途径，中国人如习日文以译日书，将“获益甚钜”。^②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亲身习日文、读日书，眼界大开，对日本吸收西学之广之深有了进一步的体验。他生动地描述道：“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

①参见《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下，光绪九年香海刊本，卷2，第10～12页；《庸盦文别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217、218页；《盛世危言》，光绪十八年刊本中的《议院》，《交涉》，《商务》二、三、五，《税则》，《银行》，《考试》，《日报》等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版，第1册，第66、65、64、76页。

沾沾自喜。”他的所见所闻证明,“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即使是兵学、艺学,也是“习之者希,而风气难开焉”。对比之下,梁启超再次重申了他曾提出过的看法:在日本,西学之“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如久厌糟糠之人,享以鸡豚亦已足果腹矣”。因此,他愿“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①

无独有偶。与康梁等维新派曾有过密切交往,但最终分道扬镳的清朝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在1898年推出的《劝学篇》中,也倡言“广译”,认为:“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应该“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采而行之矣”。同时他也承认:尽管从道光年间就有魏源等致力于“译外国各书各新闻报”,“先几远跖”,但直到甲午战争后,现实中还是“华人通西语西文者甚少”,对于西学,如“朱子所谓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者也”。反之,日本吸收西学却很有成效,它在前二十年就派遣留学生“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在此过程中,“各种西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因此,他认为:“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所以,就中国外派留学生的去向来说,“西洋不如东洋”;就掌握外文、译书来说,“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之又速者也”,“译西书不如译东书”。^②在三年后的1901年,张之洞与

①《论学日本文之益》,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0、81页。

②《劝学篇》下《外篇》,《游学第二》、《广译第五》。

刘坤一在筹划清朝“新政”的“江楚三奏”中，谈到为解决新式学堂师资问题而奖励海外留学，为促使统治集团成员换脑筋而鼓励出洋游历，依然强调日本是最理想的留学之地、应“以先游日本为急务”。^①

梁启超与张之洞各自发出上述议论之时，对于西学本身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但对甲午战争爆发前西学传入中日两国的状态和成效作出的判断，却相当接近，都认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日本却已全面开花结果，并对日本的迅速崛起和强盛起了重大作用；到甲午战争之后，在取法西方、吸收西学以实现富强的问题上，日本已具备充当中国的先生的资格了。

作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和张之洞对于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西学传播的差异，都是作为见证人来表述自己对现实的观察，且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或为维新变法的主张提供具体依据，或为拓展洋务范围指出着眼点，因此都还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的课题进行深入探究，对现状的判断固然准确，但还停留于知其然的层面。

1902年，梁启超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再次指出：“顾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而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指严复——引者）”。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迟缓归因于“政府不良”及“士之学于海外者……太负祖国”；且在论及佛教传入问题时写道：“日本小国也，且无其所固有之学，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则其趋如鹜，其变如响，不转瞬而全国与之俱化矣”；“中国大国也，而有数千年相传固有之学，壁垒严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虽入矣，而阅

^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471），《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台湾，文海出版社，第40、124页。

数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动其毫发”。^①这表明,梁启超已从中日国家政权政策和两国文化传统、国之大小等的不同,来思考西学在中日传播发生迟速差异的因由了。尽管他讲得很笼统,但认识上的推进却是毋庸置疑的。

1935年10月,郭沫若在日本东京作了题为“中日文化的交流”的著名演讲,谈到近代西学在日本迅速传播、又从日本传到中国的问题,分析原因,多沿用梁启超的观点,新颖之处在于:强调近代中日两国社会对于变更生产关系的要求有强弱之分,从而影响到两国对于西学的态度。^②当然,在一次演讲当中,郭沫若只能粗略地提出论点,而不可能作具体展开和深入论述。事实上,他后来也没有再对这一问题作过研究。

2. 当代学界的相关研究

在当代,学界围绕19世纪中国、日本西学传入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1) 关于西学传入中国问题的研究

应该指出,我国学界研究西学传入中国问题,长期将重点放在明清之际的第一个阶段,至今也还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继续耕耘,不少硕学、新秀推出了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关情况已有人作过很好的介绍,兹不赘述。^③至于围绕19世纪初以后西学传入中国问题的研究,尽管可以将源头追溯到甲午战争后不久梁启超

①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04、64页。

②参见《沫若文集》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72页。

③参见黄一农《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台湾《新史学》第7卷,第1期,1996年;徐海松《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论著目录1980—1999》,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第2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近年来,明清之际经由耶稣会士的中学西传成为研究的热点,而在西学东渐问题上,则是围绕传教士与相关中国士人、当权者的实证性个案研究日显突出。